

美育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谭好哲 刘彦顺 等 ◇ 著

本丛书以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分专题进行深入讨论，力求比较完整和深入地反映、揭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全貌。从书着重以学术史的研究方式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意义、方法和对象；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方向、特性和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总体学术历程、知识背景及其变异；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对本土美学资源的承续与突破；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学术论争及其学术建构价值。



20世纪
中国美学史
研究丛书

汝信 王德胜 主编

美育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谭好哲 刘彦顺 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育的意义/谭好哲等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ISBN 7-81064-887-X

I. 美… II. ①谭… ②刘… III. 美育—研究—中国—20世纪

IV. 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729 号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MEIYU DE YIYI

美育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谭好哲 刘彦顺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cnu.cn

E-mail cnup @ mail.cnu.edu.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03 千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作者介绍】

谭好哲，男，1955年12月生，山东栖霞人，山东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现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等。出版《文艺与意识形态》等著作3部，另主编或与人合著《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艺术与人的解放》、《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论著获省部级奖励10余项。

20世纪
中国美学史
研究丛书

汝 信 王德胜 主编

【问题与立场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

戴阿宝 李世涛 著

【承续与超越 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

袁济喜 著

【引进与变异 西方美学在中国】

彭 锋 著

【美育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谭好哲 刘彦顺 等著

【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马 驰 著

【创世之音 中国美学1900~1949】

王德胜 等著

【分化与突围 中国美学1949~2000】

薛富兴 著

总序

历经百年，中国美学在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曲折走入了较为自觉地追求思想的体系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这样一个现代形态的学术行程，从具体的理论观念到整体的学术思维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其百年来不断创新、求变的理论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那样鲜明且确有成效，令人对之产生浓厚的追索兴趣。

也因此，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界对本土问题的理论探究兴趣不断增长，有关上一个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美学界不仅为此连续举办了多个专题会议，集中讨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及其价值特性，同时，许多学者在近年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力图为 21 世纪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深化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探讨 20 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时候，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具体概念、命题或观念等的自我演化线索或个别美学家的理论成就。事实上，作为客观历史过程的学术活动，美学的生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纯逻辑

■ 总序

的。美学之所以在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活动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同它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现实思想文化运动的具体关系是直接相关的。要想充分把握 20 世纪中国美学百年发展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就必须深入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历史真实之中，从文化整体上来考察美学自身的理论历史，并从美学的整体活动来把握其思想蕴涵，使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从纯粹理论的逻辑演绎扩展为一种思想的持续进程，进而“重构”其学术发展的历史价值。这样，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研究才会更加突显出理论本身的文化和思想的价值。例如，包括美学在内，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意愿，即以学术方式致力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为现代中国社会设计民族振兴、文化进步、生活幸福的理想模式。由此，现实与理想、困厄与超越的矛盾便深深融入了各种学术的努力之中，既影响了学术活动的存在形态，又影响了其具体理论的表现形式。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应从这一方向去求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具体表现。

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必然涉及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确定。我们的探讨，重点应在于把握美学演进中的主要历史结构规律、结构性质及结构方式，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寻找美学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揭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相关性的美学的历史存在形式，而不是简单地依照“时间表”来划定近代、现代和当代等“历史段落”，或单纯理解为一套理论概念、命题等的逻辑串联，令美学史变成诸多概念、命题的机械整理和堆砌。也就是说，在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美学本身

的结构连续性，而不是历史的时间构架——美学理论的逻辑完整性必须体现出思想的有机进化层次。何况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来说，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虽然是确定的，但理论的具体结构和活动又具有种种偶然性，它们之间存在着需要我们从思想整体上去把握的规律、性质和方式。即如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及其思想方法的关系来说，我们就应思考：一方面，接纳西方美学的中国学术语境有什么特点？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从具体概念到基本方法出现了哪些变异？这种变异之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积累的影响是什么？如果说，在 20 世纪中国美学中，西方话语的存在根据往往在于引入和保存其具体形式的中国学术语境本身的现状，那么，把这个问题纳入美学的历史研究，为的就是从中看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自身精神取向及其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依据，进而把美学理论的演化过程同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真正学术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组织写作这套以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内容的丛书时，着眼的不仅是总结、反思，以求比较完整和深入地反映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面貌，而且试图能从学术史层面建构起一种新的美学史观和美学史研究方式。也因此，本丛书突出了“以问题带史”的特点，强调以学术史研究的立场来讨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学术史所倚重的知识价值特性与知识含量增长来反顾百年中国美学的意义。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当前中国美学界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探讨涉及了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

■ 总序

包括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总体学术历程及其建构方向、特性和价值，马克思主义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20 世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以及对本土美学资源的承续与突破，20 世纪中国美学重要论争及其学术建构价值，20 世纪中国美学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建设的影响和启示，等等。相信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问题会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汝 信 王德胜

2006 年 7 月

目 录

导 论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1

第一编 中国现代美育趋向论

第一章 中国美育及美育学的历史进程	35
第二章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美育新潮的兴起	50
第三章 美育本质的探讨与新时期美育的发展	87
第四章 由三本《美育》杂志看 20 世纪中国美育发展趋向	112

第二编 中国现代美育人物论（上）

1

第五章 王国维：“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	147
第六章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173
第七章 梁启超：“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	216
第八章 鲁迅：“发扬真美，以娱人情”	247
第九章 王统照：“使人类的教育，达到完善的目的”	280
第十章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	310

第三编 中国现代美育人物论（下）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第十一章 丰子恺：“美术是精神的食粮”	333
第十二章 朱光潜：“教育的功用就在顺应人类求知、想好、 爱美的天性”	361
第十三章 宗白华：“艺术教育，可以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	393

■ 美育的意义

第十四章 李泽厚：“情感本体”与“建立新感性”	423
第十五章 蒋孔阳：“成为身心健康的完美的人”	437
第十六章 曾繁仁：“审美力”与“人生艺术化”	450
后 记	462

导论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一

美育或曰审美教育，作为一种现实的教育活动和方式，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西方，古希腊人已开始用史诗、戏剧、音乐、雕塑等不同艺术形式对自由民施行艺术教育，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学理论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在我国，自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起就留下了“先王之乐”的种种传说，比如《尚书·尧典》中就有舜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周代之后，“制礼作乐”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而包含着文学和艺术教育在内的“六艺之教”（礼、乐、射、御、书、数）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无论中外，施行艺术教育的目的都在于将人美化，使人“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①，从而养成“自由而高尚的情操”^②。简言之，就是将人从粗野而凡庸的生存之域提升

1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①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②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2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至尽善尽美的理想之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了“美育”一词的发生。据现存所考材料看，汉末魏初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被魏文帝曹丕评为“时有齐气，然灿之匹也”的徐干可能是中外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人。徐干在其所著《中论》一书的第七篇《艺纪》篇中写道：

艺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故谓之彫；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为君子也，故立保民（“民”，据《周礼》当做“氏”）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辨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故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

在这里，徐干不仅明确提出了“美育”一词，而且依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说明了先王“美育群材”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以“六艺”、“六仪”来造就“群材”。在这篇文章中，徐干发挥了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古训，认为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礼乐之本”，同时礼乐又是修饰德行的枝叶，是“事成德者”。以“德音”为本的礼乐来“美育群材”的目的乃是君子人格的养成，他说：

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体全然后可登乎清庙，可羞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义不行，非艺不治，非容不庄，四者无愆而圣贤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谓大业。其斯之谓欤？君子者，表里称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称乎心志，

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著。

由此可见，“美育”在中国古代乃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本途径。

不过，尽管徐干很早就使用了“美育”一词，但该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古人经常谈论的还是“礼乐教化”、“六艺之教”。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当 20 世纪初叶，美学和美育的概念与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地传播起来的时候，是受到了徐干和其他什么古人的影响。事实上，现代的美学和美育之类的概念和观念不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从其观念内涵和思想取向上看还是对古代以道德伦理教化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的一种历史的反动。具体言之，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滥觞，首先不是缘于对古代美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基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因，起于救亡图存、教育救国的时代局势，同时也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具体观念和内容而言，首先是西方相关思想的移植和汲取，其次才是基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教育背景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状况的改造、转化与创新。换言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它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老大的中华帝国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击打下，愈加显出了其落后、腐败的实相，面对着国权沦丧、种将不保的危急局势，惊醒起来的中国人开始了以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为目的的艰难探索，中国社会也从此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19 世纪中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势，封建士大夫中一部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最早惊醒过来，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强烈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主张用“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革旧的传统教育，从而改良政治、改变学风，提倡学习西

方的科学技术，以达到抵御外侮、“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目的。其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更是秉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把兴办新式学堂、造就懂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视为中国富国强兵的根本和当务之急。再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有识的中国人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之国势颓委、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①。要改变这种局面，根本的办法在于通过变法来“新民”。新民是变法之本，也是国家强盛之本。而要新民，首要的在于开民智、伸民权。开民智，就要兴办新式教育；伸民权，就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兹举三人为例。一是清末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在该书的《学校》（1892）一文中，郑观应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②在《西学》（1892）一文中又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③。二是严复1895年3月刊于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严复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论述了中国通往富强之途、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① 严复：《原强》，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7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47页。

^③ 同上书，54页。

基于这个普世通则，故中国

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①

严复所谓“鼓民力”，就是要通过禁绝和改革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样一些不良礼俗，以培养人民健康的身体；他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开办新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严复认为上述“三者乃强国之本”，而其中，他又特别强调民智者为“富强之原”。第三位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氏在其作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一书的第二节“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以更为清晰的理路和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说：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②

在该书的第三节“学校总论”中，他又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变法的首务，强调中国之衰乱由于教之未善，“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甚至说：

^① 严复：《原强》，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173，17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② 《梁启超全集》，第1册，1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①

这与严复的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循此思路，在同作于1902年的《新民说》和《论教育当定宗旨》等论著中，梁启超又依据天演物竞之理指出，当今的时代乃民族帝国主义崛起与盛行的时代，“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②这是从“外治”即外患方面着眼，而从“内治”即祛除国家内部的腐败堕落达至除旧布新的局面来说，也惟有新民一途。“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③苟如此，国家又何患之有？而欲新民，则非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兴办新学不能为也。他强调说：

一国之有公教育也，所以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竟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故有志于教育之业者，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之界说，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④

由以上诸多的引证可见，中国现代教育是在国势危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换言之，它是富国强兵的追求，是社会现代化之时代需求的产物。而中国现代美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境况和教育背景中孕育并展开的，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育首先必须明了的一个历史前提。

此外，与这种中西交汇、社会转型的时代境况相关联，中国现代美育的发生也与西学东渐的学术气候密切相关。自19世纪中叶中

① 《梁启超全集》，第1册，17，19，2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② 《梁启超全集》，第2册，657页。

③ 同上书，655页。

④ 同上书，911～912页。